

跨文明对话书系
KUAWENMING DUIHUA SHUXI

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叙事

——关于农民、革命与
现代性之关系的文学表达

黄曙光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跨文明对话书系
KUAWENMING DUIHUA SHUXI

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叙事

——关于农民、革命与
现代性之关系的文学表达

黄曙光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叙事:关于农民、革命与现代性之关系的文学表达/黄曙光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9. 3
(跨文明对话书系)

ISBN 978-7-80752-294-2

I. 当… II. 黄…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914 号

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叙事 ——关于农民、革命与现代性之关系的文学表达

黄曙光 著

责任编辑 谢艺波
封面设计 杨 艳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0.5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294-2
定 价 23.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跨文明对话书系》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朱立元 曹顺庆

主 编：徐行言

副 主 编：汪启明 傅勇林 段志洪

编审委员会委员（按音序排名）：

柏桦	段志洪	傅勇林	高力	李岗
阮航	施维	苏志宏	汪启明	徐伯初
徐行言	谢艺波	易伯伦	赵静	

总 序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自古而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由来已久。然而自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以致于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少东西方学人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乃至生活方式视为衡量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尺，把社会进步的理想目标定位于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或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普世文明。所谓西风东渐、西学东移，相当一批东方学人和政客也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做西方文明的必然产物，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将扬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器物、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作为实现现代性改造的唯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遂呈现为单向的态势——以先进的西方文明征服、影响和改造其他“落后”或“野蛮”的文化似乎成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生活的必然趋向。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由于交通、信息交流的日趋便捷，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不同地域和文明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和文化联系不断增强，人员、商品、信息乃至生活方

式、思想观念的流动和相互沟通日益增长，逐渐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各种复杂关系渗透交织的网络，全球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势所趋。然而，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将出现一种全球同质的“世界文化”或“地球文化”，相反，随着西方式工业文明内在矛盾的凸显、西方知识界的自省和一大批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本土化、地方化也成为全球化语境下许多后发区域维护民族文化遗产、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策略。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不再是简单地演绎强势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及其他弱势文明的征服或同化的模式，相反长期处在边缘的第三世界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对现代性的诠释，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寻求走向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与道路。

尽管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对抗仍难以避免，不同文化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与冲突依然存在，但和平发展、和谐相处毕竟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因此，对话正在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基本立场和方式。

何谓对话？对话的实质应是不同主体间双向互动的交流。哈贝马斯把对话作为不同社会阶层交往的主要形式，认为通过对话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正是交往行为的目的。而巴赫金则将对话关系看做无所不在的现象，他认为整个人类的语言、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乃至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之间都浸透着对话关系。毋庸置疑，对话的精神是交流、沟通与互动。这里有相互的凝视、好奇与欣赏，有积极的理解、借鉴与汲取，有主动的自省、调整与改造。总之，它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学与互渗过程，文化学所总结的关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互化与涵化现象都可以说是对话的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文明间对话的基础应是平等、相互尊重，而不是仰望或歧视，更不是恃强凌弱的输出与同化。

那么，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当怎样进行呢？显然，我们所理解的文明间的对话并非政客之间的会谈，也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文化交往，甚至不一定都来自实际的接触行为或交互关系研究所产生的主题，而是包括能使文明之间产生碰撞与交流的所有可能形式——它有时借助于面对面的接触，相互汲取对方的优势，滋养自身的肌体；有时却并无直接交往，只是文明画廊中不同文化间差异的自然呈现，各自在对异域风景的注视中产生心有灵犀的感悟、启迪，乃至误读。此时，其中一方只需利用某种可以达成沟通的媒介和语言，将自身的文化特征与个性表达出来便已成为对话的主体。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将这一套丛书定名为“跨文明对话书系”。这里汇集了西南交通大学“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艺术与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一批教授和博士多年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经典成果的多视角研究，关于中外语言文学的交流与影响的个案分析，以及基于现代学术立场、运用现代方法进行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个案研究，可谓众彩纷呈。此中既有对过去的中西对话所产生成果的研究总结，也有在当下的语境中对他文明的审视与读解，还有对中华文明自身文化传承的整理与反思，其中自应包含着对新的对话的期许。相信这些学术探索对于读者加深对全球化时代中西文明的交互作用以及东西方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会有所裨益。

感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基金的支持。让我们将这一系列学术成果作为西南交通大学年轻的人文学科对正在走向多学科协调发展

展的母校的献礼，并借以恢复“交通”这一术语最古老也最丰富的意蕴。

徐行言记于斑竹苑

2008年6月

目 录

导 言	(1)
绪 论	(5)
一 农民：启蒙对象与革命主力	(5)
二 农村题材小说：农民命运的另一种书写	(21)
第一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土地改革与农民的被解放	
.....	(36)
小 引	(36)
第一节 对革命的质疑与焦虑	(45)
第二节 恶霸还是地主？	(56)
第三节 农民：在革命的利益与风险面前	(72)
第四节 蒙昧个体与群体暴力	(87)
第五节 “密谋”与“美人计”	(101)
第二章 《创业史》：互助合作与社会主义想象	(117)
小 引	(117)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农民·····	(124)
第二节 土地情与创业梦·····	(153)
第三节 从农村到城市·····	(175)
第三章 《平凡的世界》：从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 ·····	(195)
小 引·····	(195)
第一节 革命余波与历史面纱·····	(206)
第二节 城乡分治下的农民·····	(225)
第三节 农民突围·····	(252)
第四章 《高兴》：流落城市的现代农民 ·····	(271)
小 引·····	(271)
第一节 被城市分裂的身体·····	(277)
第二节 “隐身人”与当代中国“种族”意识·····	(290)
第三节 城市怨愤与乡村情结·····	(304)
结 语·····	(315)
参考文献·····	(319)

导 言

自新中国成立前夕开始，随着革命的推进和土地改革的开展，中国古老的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解放区为代表的农村题材小说开始突破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范式，和政治革命有了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乡土小说，自始有了新的气象、新的任务、新的主题和新的格局”^①。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村题材的小说和新中国农村的革命与建设紧密配合，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几十年来新中国农村走过的历程，折射出几代中国农民复杂多变的命运。

如果要为 20 世纪中国历史找出关键词的话，革命和现代性肯定必不可少。无论是从革命还是现代性角度来看，中国农民都是历史演变进程中重要的主体。在现代性启蒙阶段，中国农民被视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批判和启蒙的首要对象。而在后来的革命中，中国农民扮演了绝对主力，最终以

^① 庄汉新、邵明波：《中国 20 世纪乡土小说论评》第 14 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 年版。

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开始后，农村的革命运动继续风起云涌，一波接着一波。到了 20 世纪末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工业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农民的处境日益艰难，一时，关于农民出路的“三农”问题^①，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热门话题。从 20 世纪初中国步入现代史阶段后，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开始逐渐松动，古老的乡村田园生活开始受到革命和现代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告别相对的静止和稳定，开始了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由静到动，由常到变，中国农民只能置身历史潮流，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系列大动荡、大变革。从文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农村在革命与现代化浪潮冲击下发生的变化，考察在动荡的历史进程中农民曲折多舛的命运，思考现代性背景下中国农民的处境与可能的出路，是本文最主要的写作动机。

20 世纪中国农村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始于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和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第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②。土地改革主要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 1946 年至 1949 年老解放区的土改，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新解放区的土改。本文选择土地改革作为考察的起始点，研究对象主要就限定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之内。

① 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统称即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 1996 年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于 2003 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引入工作报告，并随之迅速成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三农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②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第 404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由于选题涉及作品很多，而文本阐释又是本论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所以首要的问题便是作品范围的圈定。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笔者首先确定的作品对象是相关的长篇小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先后经历的重要历史阶段有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几个时期，每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数量不少的长篇小说。比如反映土地改革的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有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等，人民公社时期的长篇有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陈登科的《风雷》，集体创作的《惊雷》等，新时期开始后农村题材的长篇就更加丰富了，著名的有贾平凹的《浮躁》、《秦腔》、《高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以上罗列的还仅限于作品反映的是与创作时间属同一历史阶段的作品。而在后来历史阶段写作的反映以前农村历史的作品就更多了，比如新时期以来创作的大量反映土地改革、反映“文革”时农村（属人民公社时期）的作品，也都在初次考察的范围之内。

把这些作品与新中国农村历史进程结合起来，便会发现同一历史阶段的作品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典型的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创业史》与《山乡巨变》、《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等等，无论在主题、内容甚至叙事策略方面都很相近。从各阶段分别找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以点带面，一部作品就代表一个阶段的历史，便有了本文的基本思路与框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代表土地改革阶段，《创业史》代表农业合作化阶段，《平凡的世界》横跨人民公社和农村改革两个历史阶段，而《高兴》则代表城市化工业化步伐越来越快，而农村

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民迫于生计大量涌入城市的最近十多年。四部作品联系起来，刚好贯穿从土地改革至今大半个世纪的农村历史。

从几部作品来看半个多世纪中国农村的历史，看中国农民在革命与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特殊命运，这也是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的一种方式。虽然文学不是历史，但文学里一样爬满了历史的蛛丝马迹。如果说历史文献里爬满了历史事实的蛛丝马迹，那么文学作品里则爬满了情感和心灵的痕迹。这是一种源于真实生命的声音，一种与个体的生存体验息息相关的声音，一种来自心灵的挣扎与灵魂的追问的声音，一种感叹或控诉的声音。它不像历史文献那样斩钉截铁、貌似客观，永远不会成为考证家笔下的一个注释。它仅仅是一种声音，一种隐约的飘荡在历史的字里行间的声音。只有对虔诚的谛听者而言，它才存在，才会在心灵里留下回响。阅读当代农村题材小说是面对当代农村历史的必要补充。正是这些作品，呈现了特殊的历史变迁对个体生命的具体改变，让被官方的历史书写充分遮蔽的个体心灵的呻吟与呐喊，留下依稀可辨的痕迹。对于这段特殊的历史而言，这些文学作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丰富了历史的书写，它让历史不仅与宏大的事件相关，也与个体的情感、心灵和生命相关。

绪 论

一 农民：启蒙对象与革命主力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度，历来以农为本，无农不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是传统文化生长的土壤，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基本的生存背景。如果不是数典忘祖的话，只要是中国人，大概都可以坦然地承认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农业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强大的基因，它构成中国人鲜明的文化身份，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视野、价值观念、美学趣味和人生范式等多个方面。尽管在传统社会里，士大夫阶层可能疏远或者不屑于具体的农事耕作，但是他们最基本的精神渊源和人生经验都离不开“乡土”。从骨子里讲，他们首先是农民，然后才是知识分子。而且，“知识分子因其教养和精神生活，也因其与土地的非基本生存关系，更利于保存古旧梦境、传统诗趣，知识分子往往是比农民更严整的传统人格”^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园先生说：“广义的农民文化，即使不等同于传统文化，也是其重要部分；

① 赵园：《地之子·自序》，《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且因形态的稳定单一而具体，易于标本化。”^① 因此，在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学传统里，“乡土中国”及由此生发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感悟，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笔下的主要内容。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历代繁华都市的影迹，但是城市仅仅是作为农业文明的延伸而存在，是农业子民在田间地头以外的另一生存空间。城市即使成为诗人的书写对象，承载的依然是浓郁的乡土趣味。哪怕到了 20 世纪，乡土依然是中国作家最基本的生命背景。所以“城市从来没有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或乔伊斯在都柏林所找到的哲学体系，从来没有像支配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支配中国文学的想象力”^②。

意识到自己文明的“农业”特点并非易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心目中只有自己的一种文明。也就是说我们曾以为我们的农业文明是天下唯一的文明，真正的文明。即使还有其他的文明，那也只是化外的蛮夷之流。这种封闭自大的心态一直到鸦片战争的惨败，才开始受到冲击。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华大地。再也无法回避，我们被迫面对另一种陌生而强大的文明。从此，认识研究比较学习另一种文明，成了中国学人的基本功课。正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并置与比较中，中国传统文明的“农业”特点才凸现出来。我们遭遇的西方文明是经历了几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工业化城市化是其显著的特点。正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准，我们才获得了从另一角

① 赵园《地之子》第 73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5 年第 3 期。

度打量自己文明的机会，才发现以“农业”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以及自己作为农业子民在世界上的真实处境。

东西文明的并置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可谓强弱悬殊，高下分明。西方文明在中国学人的眼中从夷学、西学到新学，很快确立起在东方文明前的强势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西方文明的诸多标准确立为“现代”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而以“农业”为基本特点的传统文化则被视为“前现代”的，成为中华民族向前发展必须超越的对象。这样一来，东西文明并置的空间概念便转化为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时间概念。西方不再仅仅是我们空间意义上的邻居，更是我们的未来和理想。再加上达尔文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华子民逐渐抛弃了根深蒂固的今不如古的时间观念，接受了与之截然相反的另一时间观，于是乎，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作参照，一个崭新的时空呈现在古老的中华民族面前，诱发古老子民关于未来的无尽想象，历史的车轮终于在泥泞和混乱中缓缓驶上了“现代”的轨道。“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漩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①

现代化追求使中国人跨入了一个“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空间。这种说法对一位西方学者而言，似乎难掩几丝洋洋自得。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则意味着忍辱含羞和痛苦的自我

① 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邓正来译，见萧廷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19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